

# 动物寻古 对话殷墟

王雪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大门，向前略走几步后左转，尽头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已经斑驳的“殷墟考古数据库工作室”的标牌。标牌所属的屋子位于一排平房的南端，屋旁矗立着一棵亭亭如盖的核桃树。这里位置独立，不易受到外界干扰。安阳工作站技师孟军就在这间屋子里整理河北商城制骨作坊遗址出土的骨料，长方形的桌子上摆放着电脑、电子秤、卡尺和现生动物骨骼标本，她的手边则堆摆着盛满出土动物骨骼的塑料筐，足有一人多高。拼对、分类、鉴定、测量、观察、称重、记录，这便是她每天的工作内容，繁琐而又重复。而在另一个整理室内，技师管明丽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对距今3000多年的动物骨骼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解读，将这些深埋于地下的“无字天书”进行翻译、转化，为考古学家复原社会和重建历史提供基础材料。

时光流转，南墙外的核桃树落叶又开花，现在已是孟军和管明丽与骨头打交道的第15个年头了。尽管更换过多个工作地点，但不变的是她们始终携带着在身边的那些骨骼标本、测量称重工具以及有些泛黄的参考书，这也正如她们对待考古事业的初心，择一事而终一生。

## 结缘“考骨”

在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史中，制骨手工业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殷墟的动物遗存研究最早见于德日进和杨钟健的《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一文，该文的研究范例在动物考古学研究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02年、2006年，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发掘出土了36吨动物骨骼。整理如此巨量的材料，不仅要面临大量时间、经费等投入的挑战，也迫切需要专业动物骨骼鉴定人员参与其中。

追忆往昔，孟军和管明丽对于考古工作的第一印象，还是从清洗陶片开始的。当铁三路制骨作坊整理任务“找”来时，她们也未曾想到从此与动物骨骼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的大规模发掘，到如今涿北商城制骨作坊的精细化发掘，这个缘分竟持续了十几年之久，“骨头”成了她们工作与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她们身份的重要标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李志鹏博士是带领孟军和管明丽入门的重要指导老师，他们不仅是“师生”，也是最为默契的工作搭档。孟军坦言，直到现在，她们在整理时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还是要寻求李老师的帮助。当然，师傅领进门，接下来的“修行”还是得依靠学生自己的勤学苦练，这对于文化水平不高，且没有任何动物考古学研究基础的她们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铁三路制骨作坊虽然出土了盈千累万的骨料，但绝大多数是黄牛骨骼，这无疑为孟军和管明丽快速入门提供了便利。鉴定是动物骨骼整理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孟军和管明丽结合整理内容特点，从黄牛骨骼部位、左右骨骼的辨识开始学起，边学边琢磨，边学边工作。但艰巨的任务留给她们的学习时间非常有限，想要在短期内熟练鉴定骨干、关节等大块骨骼，仅依靠白天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赶上进度，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也被她们用来“琢磨”骨头，那段时间她们与骨头形影不离，记不住就拿着图谱与标本一遍遍比对，整理时有疑惑就互相讨论，除了常见的骨骼特征外，她们还留心总结不同骨骼的形状、弧度、厚度、骨骼内壁的纹路以及有无松质骨等具体特点。她们对骨头的痴迷甚至延续到了日常生活中，平时吃饭但凡遇到骨头，都会留心观察其形态特征，辨别骨骼部位，甚至还尝试自己动手制作骨骼标本，用于观察和学习。

铁三路制骨作坊除了黄牛外，还有马、鹿、猪、狗、羊等动物。因为制骨作坊出土最多的是黄牛骨骼，孟军和管明丽就以黄牛骨骼为参照系，在李志鹏的培训下学会触类旁通，渐渐掌握了不同动物的骨骼形态特征和鉴定特征，逐步建立起家养动物骨骼鉴定的基本知识框架。走到这一步，她们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然而对于孟军、管明丽来说，在这些看似简单的学习步骤背后，需要付出的是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与坚持。在将近不惑之年重新踏入一个新的领域，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工作内容的困难、家庭的琐碎、记忆力的衰退都在不断考验着她的耐心与毅力。时至今日，她们再回忆起当年，种种艰辛仍历历在目。

铁三路制骨作坊中的多数骨骼经过锯切、锉磨后，仅余下少量不可使用的部分，甚至有如指甲盖大小者。随着学习的深入，李志鹏老师对孟军和管明丽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大块骨骼要鉴定到具体类别，分辨前后、内外和左右侧，小块骨骼也要尽可能地细致鉴定，记录骨骼表面特征和痕迹。每隔一段时间，李老师都会检验她们的学习成果和工作内容，敦促她们不断进步。

按照预先设计的整理方案，从2008年开始，孟军和管明丽用了5年时间初步完成了铁三路出土骨骼的整理任务。随着一筐筐骨骼被归入仓库，裹上岁月的尘埃，她们与铁三路的故事也被定格于此。但这里的每一块骨头都曾见证了她们的努力、拼搏与坚持，见证了她们踏入动物考古学领域的艰难历程。夏天闷热的库房、冬天被冻得不可屈伸的手指，这些困难都没能消磨她们的初心，反而使她们愈加坚定，不断超越自我，最终成长为优秀的动物骨骼鉴定技师。

## 走向田野

2020年，位于涿北商城宫城西北部的制骨作坊发掘工作启动，孟军被派往工地，带领学生在现场进行骨料清理、鉴定和提取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参与田野发掘，也是首次将工作的场地转移至室外。

在多学科合作的前提下，为更全面地获取与制骨手工业相关的材料和信息，领人何毓灵和老搭档李志鹏认为精细化发掘势在必行。旧石器时代的“打格分方”法被借鉴过来，合作策划适合手工业作坊的发掘与遗物记录、收集的方案。发掘者采用了水平分层和垂直分区相结合的发掘方式，使制骨废料坑中的每一块骨骼都拥有了唯一的层号、区号和数字编号，并有专门的记录。2020—2022年，一共清理了7个制骨废料坑。孟军作为这次发掘中的主力，又一次接受了两位老师的重任，只不过这一次工作舞台直接移到了遗址田野发掘现场，几乎参与了每个



管明丽整理铁三路出土动物骨骼

废料坑从分层、分区到骨骼提取的全过程，现场编号收集了四万多件标本。历经漫长岁月埋藏的骨骼，在清理出来后需要抓紧时间拍照和提取，暴露时间过长则会引起风化，影响骨骼的保存和辨认。多个废料坑同时发掘无疑给孟军带来了不小压力，尽管有学生帮忙，但作为专业的动物骨骼鉴定技师，虽然李志鹏在发掘之初已经基本定下来工作流程和观察、记录与提取方案 and 新的针对性训练，她依然需要辗转于不同废料坑中，自己留心观察和记录特殊现象，自己独立或和李志鹏讨论解决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这不仅需要精细化发掘的要求，更是敬业与负责的体现。有些坑中的骨料细碎且密集，甚至还堆积着成片烧骨，这些特殊骨骼不仅辨认个体困难、编号耗时费力，提取时更须小心谨慎，以防破坏骨骼的完整性。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对于学生提出的疑惑，孟军也总是认真解答，毫不吝啬地传授自己的鉴定经验，从不同角度启发和引导学生。

从一个灰坑到另一个灰坑，从一个格子到另一个格子，寒来暑往，孟军始终坚守在发掘现场，日复一日地编号、鉴定和记录。疫情期间出行受限，为了不耽误进度，孟军更是过上了起早冥醒的生活，一天之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了工地。因为倾注了太多心血，这些骨头她比谁都更要熟悉，也十分珍视，每每谈起涿北商城的骨料，她的眉眼中更是尽显神采，对涿北商城的制骨工艺和生产也有自己的思考，“涿北的‘剥片式’取料明显跟铁三路不一样，涿北更注重对骨骼的高效利用。铁三路出土了不少骨器成品，但在涿北这次发掘中却很少见，说明这里可能不是作坊的核心生产区。”四万多件标本对应的更是四万多份手写标签和记录，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在每一块骨骼上发生的古今对话，更记录了孟军数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与孟军一样，管明丽也迎来了她的田野挑战，用她的话说，2023年是她的“狗年”，2024年是她的“马年”。

2021年开始，殷墟王陵区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启动，不仅首次发现了围绕在王陵区周边的沟洫，更是新发现了一批祭祀坑，祭祀坑内出土的动物骨骼有马、狗、羊、猪、鹿、牛等，动物种类十分丰富。

当听说李志鹏老师要把现场鉴定的工作交给自己时，管明丽有点想打退堂鼓，毕竟室内鉴定与现场鉴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一个祭祀坑内多个动物交织叠压在一起时，根本分不清个体，但干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志鹏老师在现场手把手教，记录怎么写、照片怎么拍、分不清个体的时候就顺藤摸瓜……慢慢捋……说着容易做着难，待李老师一离开工地，管明丽立即感到千钧重担压在自己肩头。这批祭祀坑，人和狗在一起祭祀的不多，特别是K25、K26这两个祭祀坑有人和狗是混在一起，用管明丽的话说，“真是感觉人中有狗，狗中有人！”鉴定K26祭祀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以至于晚上睡觉都是在连说带比画的，早上起床她爱问她半夜睡觉又说又比画的是干嘛呢？“分狗架呢！”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看着自己绘制的草图，基本理清了头绪，管明丽觉得，当时祭祀时一定有其规律和含义。

2024年，殷墟王陵区又发掘一批祭祀坑，有猪、鹿、象、狗、牛、马等，但以马的祭祀坑最多，所以管明丽说这一年是她的“马年”。从三月到十一月，管明丽一共在王陵区鉴定了18个祭祀坑，其中马祭祀坑就有12个，有2匹马、4匹马，最多的一坑有6匹马。马的摆放姿势各有不同，其中有几个祭祀坑的马，后腿被高高地抬起，前肢微曲，摆出奔跑的姿势，可以让人遐想到当时马儿在奔跑的场景。

之前为了让管明丽进一步掌握马骨的鉴定以及马的年龄、性别等专业的判断依据，李志鹏老师又从北京赶过来教会管明丽怎么鉴定马的年龄、性别、病理……，这些让管明丽也成为鉴定、分析马骨的行家里手。管明丽说，在鉴定这些动物骨骼时，看着是不会动的骨架，其实它会告诉你很多信息，它多大了，有没有生过骨骼病，生前是用来骑的战马还是用来拉车的……从原来的为了工作而工作，安排干啥就干啥，到现在对这份工作的喜欢和热爱，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与探究，考古工作真的是看着枯燥、无味，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乐趣是无以言表的。

殷墟见证了孟军、管明丽的成长，她们也用奋斗与拼搏在殷墟发展史中留下了珍贵回忆。她们与骨头结缘，也因这些骨头获得了对话历史、触摸历史的机会。她们在不断的探索与挑战中，得以深切感悟考古，扎根考古。“技师”一词之于她们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在安阳工作站，还有许多像孟军、管明丽这样优秀的考古技师，他们从事着田野发掘、器物绘图、青铜器修复、甲骨文拓印等工作。这些身怀绝技的技师，与考古相伴而生，他们用技艺和智慧将破碎的历史拼接成型，帮助考古学者架起了沟通过去的桥梁，推动了考古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工作看似平常无奇，却积淀着经年累月淬炼成的珍重技艺。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到父辈的熏陶，薪火赓续，奋楫笃行，他们深知技艺的精华并不依附于工具，也不在手上，而是那份永不懈怠的责任心，以及不间断的自我超越和磨炼。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大放异彩，却在报告的致谢中被一笔带过，他们为考古事业奉献终生，却被隐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平凡而又伟大。得益于他们的贡献与坚守，文明的内涵被无限丰富地延展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铁三路制骨作坊整理人员合影



孟军带领学生提取涿北商城出土动物骨骼

性别本身是生物学所决定的，男女两性是自然界基本的存在形态。高等灵长类动物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工，人类在百万年演化过程中是如何随着外在文化适应手段的提升，从生物学性别开始向社会性别转变并最终形成社会分工，这其中的过程和动因都需要通过考古学来阐释。社会性别（Gender）最早是一个人类学上的概念，与生理层面的性（Sex）相对，性别强调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而形成的在社会角色、行为、思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盛行，在此影响下西方考古学最早提出了性别考古这一概念。也正是源于女权主义影响，起初性别考古主要用于研究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从而打破研究中长久存在的男性主义偏见。后随着性别考古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定义中的Gender不再仅仅侧重于阐释女性，而是旨在强调探索两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尤其对于史前考古而言，主要是聚焦于自人类起源到农业起源、早期国家起源中由性别建构起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复杂演化过程。如果说在漫长的人类早期演化中，性别更多类似于高等灵长类或杂食性动物的生理本能，到数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性别意识及其社会因素则伴随着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而日益凸显，并影响着因性别间的“博弈”而产生的不平等。

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的性别可直接观察到，但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识别出性别因素却十分困难，除直接的人性别鉴定外几乎无法寻找到更多的证据与性别直接绑定。正因如此中程理论在相关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借用大量的民族学材料辅助推理，以架起从考古材料到解释社会结构间的桥梁，这一方法在西方史前性别研究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以民族志材料为先导，如在美国西南考古研究中，学者通过运用相当于“直接历史法”的可良好对应的民族志材料，来着重观察性别在农业适应中的作用，并最终通过类比得出了该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过程中，女性多参与到植物采集、驯化决策、加工食用等环节，而男性多与狩猎活动相关联的论断。以此为依托，研究者将西亚南黎凡特地区从纳吐芬文化时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并建构出分析模型上讨论性别分工差异，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只讨论性别鉴定，而迈向了对社会因素的探讨之中。

其实，相较于西方性别考古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对性别考古这一议题也并不陌生。20世纪60至80年代学界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原始社会划分中的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关键概念展开了诸多可归属在“性别考古”范畴内的研究，即多从墓葬来探讨史前社会形态。极具代表性的是对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社会形态之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性别考古研究自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稍显沉寂。21世纪伊始随着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引入，中国学界也展开了不少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作为对中国性别考古研究的接续之作，书中汇集了诸如社会角色、性别分工、社会权力、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研究。研究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历史时期考古，而对史前时代性别考古的关注相对较为薄弱。

与历史时期考古不同，史前考古由于缺乏文献，因而在考古材料中寻找性别因素更加困难。考古科技分析技术可以为我们寻找人类物质遗存中的性别因素提供基础。

## 考古科普

# 草鞋山玉琮：揭开一个千古之谜

高蒙河 宋雨晗

清代乾隆皇帝世称“玉痴”，他爱玉、藏玉、赏玉，甚至还钦定玉器设计图稿，使清代宫廷玉器达到古代制玉的最高水平，世称“乾隆玉”。

据说而今故宫三万多件藏玉中，就有约半数乾隆时期入藏的，乾隆还创作了800多首咏玉的御制诗文，既有对玉器的称颂和赏鉴，也有对玉器的困惑和误识。

其中，有一种玉器令他反复考量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寿终也未得尽解。然而，在他去世170多年后，苏州草鞋山遗址的一个惊世考古大发现，不但了却了乾隆皇帝生前的遗憾，还为世人揭开了一个千古未解的玉器谜面，乃至成为后来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 乾隆皇帝的一生困惑

距今二三百年前的清乾隆十三年（1748），37岁的乾隆皇帝迷上了宫廷收藏中一类器型独特的古玉，此后一直到82岁，乾隆皇帝一直没有停止对这种玉器的观察和研究，并记录成诗共计17首。

乾隆是位长寿皇帝，终年88岁，他对这种几乎历经半生题写诗句的玉器，也一直困惑该如何定名，是何用途，出何时何？

比如1778年夏，他在御题诗《题汉玉辒头珮》写道：“辒头于古不为重，重以历今千百年。物亦当前弗称宝，人应速后乃知贤。试看血土沉沈（沉）浸，已阅沧桑几变迁。张释之言真可省，拈毫欲咏意翃然。”

被乾隆称作“辒头珮”的汉玉，在乾隆的17首诗中，有时还被写作“辒头”“红头”等。乾隆考证认为，所谓的“辒头”，就是古时候肩抬车辇或乐鼓时，用来套在车辇或乐鼓前面横木上的玉器。

不过，这个推测困扰了他几十年。乾隆年老时在写最后一首为此玉器的题诗中怀疑，“辒头”不太像是古代辇车套在抬杆上的饰物，觉得杆木端头如果套装“辒头”，抬举者肩部会不会被搁得不舒服。

乾隆对“辒头”年代也多有思忖：“呼为辒头者，不知起于何时？”他的17首有关“辒头”的诗，题为“汉玉”的15首，题为“古玉”和“旧玉”的各一首。从他写的“远当虞夏近称周，曰汉还应贬一筹”“辒头曰汉古于汉，入土出尘沧桑更”等诗句看，他已意识到“辒头”可能还不止是汉代的，早到夏商周时代或更远古时期也不是不可能，“为古器无疑”。

## 迷失在历史中的玉琮

被乾隆视为“古器无疑”的“辒头”，其实谜底就是现今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常见的史前玉琮。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柱形玉器，柱体上的横刻纹饰把柱体分出数量不等的节数，少的一节，最多达十九节。它

人类骨骼考古学除可以鉴定性别外，古病理的研究也可反映出两性分工以来人类骨骼的物理变化规律，如识别出因长时间固定劳作所带来的劳动损伤。此外，生物化学中的DNA、同位素等分析手段，能够提取更多关于两性社会因素的信息。例如通过对人骨中C、N稳定同位素的统计分析来还原古人的饮食结构和生计方式。同时，中程理论，还包括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方法，可为从考古材料向社会生活阐释的过程中架起链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性别意识与实践在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过程中日益显现。按照狩猎采集聚落体系理论，采取集食者模式的群体最终更可能走向食物生产，这种生计模式下就存在停留时间较长的中心营地，这为我们从空间上探索性别因素提供了可能。以往的解释中，男性一般是在聚落外从事狩猎活动，女性则更多在居址内承担照料老人和幼儿的任务，同时在居址周边进行与植物采集、加工的相关工作。可以想象的是，倘若女性承担更多的植物收集加工工作，其掌握的相关知识或许促使女性“主导”着从选取可供种植的植物种子到进一步驯化动物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女性很可能就成了“农业起源”的主体。对应在考古材料中看到的个体装饰品的崛起，食谱中摄取营养的不均衡，明显的女性形象的艺术品，更加精致维护的火塘与居址等，似乎都反映着两性的“不平等”。此外石器生产技术可能也并非某一性别的专利。通常对打制石器技术的研究未关注到石器生产背后的性别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存在石器小型化现象，这种变化趋势或许指向至少在该时期女性有能力参与到加工和使用石器工具的工作中去。例如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一种大型的锐棱砸击石片与水生资源利用关系密切，研究者通过实验来论证女性可能是这类石器潜在的制作者与使用者。不仅如此，陶器的起源可能也与女性密切相关。陶器伴随着狩猎采集人群流动性的下降而出现，这意味着部分人群在营地停留时间较长，那么主要负责照顾营地的女性就可能更多参与了制陶，这一点在民族志资料中也可看到大量例证。有研究注意到了陶器纹饰布局中的性别因素，并结合遗址内其他遗存推导可能存在着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除了具体的物质遗存外，也有学者探究遗址空间布局中的性别因素，即在居家考古概念下通过判断房址中的活动分区（食物加工区可能为女性区，工具集中区可能为男性区域）来判定是否出现性别分工并将其与社会复杂化程度相关联。

可以看出，以上史前考古关于性别因素的研究中，都不是以所谓“性别考古”的单一概念而进行的，性别考古更像是一种视角和理念，具体的开展研究仍需要回归到考古学理论与材料的互动中去。从性别鉴定到社会性别阐释再到构建史前社会需要一个完整的推理链条。当我们围绕着人类两性演化的问题探索时，狩猎采集人群是如何向农业转变的，是谁在此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建立后性别分工又是怎样出现的，分工又为何会造成性别间的不平等，而这最终又是如何促使阶级的出现和社会复杂化的？从农业起源至早期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性别考古是非常重要的切入视角，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场域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不同的解释，并最终构建起更加立体丰富的史前社会演进图景。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起源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古国，为国王和贵族所有，象征着拥有者的高身份和至尊地位。

玉琮在先秦史籍中也不乏记载，比如西周时期所著的《周礼》就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琮是一种祭祀天地用的礼仪用器。从五千年前的良渚时期传到了周代，而且还有文献记载。

东汉时期对玉琮的认知逐渐模糊，许慎的《说文解字》、东汉柳敞碑上的“六器”图，对琮的名称、时代、用途渐趋迷茫，连琮的形状图样也已变形走样。北宋时赵九成《续考古图》著录中对玉琮的记载，已经千疮百孔，完全对不上号了，玉琮彻底进入了历史长河的失忆状态。

一生未解为何物物的乾隆带着疑惑去世之后，清光绪年间文人吴大澂《古玉图考》终于弄辨出所谓“辒头”，原来就是古文献上说的玉琮。这才算把实物和图文真正画上了等号。但玉琮究竟是什么时代的玉器呢？当时的人们又多误认为是周汉时代的，不曾想过它的年代其实还会更久远。

## 一朝出土惊天下

千古之谜常有，考古使它复活。1972年至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县的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里，第一次发掘出土了玉琮。世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玉琮是一种被大量制作和使用的史前时代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年代坐标是距今5000年前后。

草鞋山遗址考古首次证明了玉琮是良渚文化遗物，既了却了乾隆皇帝一生的困惑和遗憾，也为中国玉器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局面，拉开了考古学家关注良渚时期长三角地区五千年文明起源研究的大幕，开启了后续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热潮到来的先声。名不见经传的苏州草鞋山，由此声名远扬，创造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中国考古大事件。

顺便说到，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高等级玉琮的出土，还意味着5000年前的草鞋山所在地，早已不再是6000多年前马家浜文化、5500年前崧泽文化时代那种普普通通的史前平民村落了，而应是当时的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换言之，把苏州的建城史提前到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不再是没有依据的妄言或虚语了。

玉琮传承，千古之谜；考古解密，还看今朝。如今，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建成开放，向我们展示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这一苏州早期发展的历史年表和画卷，向世人揭示了苏州城市起源与发展的悠久历史底蕴。

草鞋山遗址不仅承载着苏州的历史文化，也蕴涵着长三角江南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